

论哈琴反讽美学的元现代性

王 洪 岳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加拿大当代文艺理论家琳达·哈琴以其独特的反讽理论迥然有别于历史上的反讽理论,也不同于同时期的后现代反讽观。她将反讽同后现代政治结合在一起,并试图改变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解构性内核,在“后现代之后”的文化语境中重建具有张力和建设性的文化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哈琴的反讽政治美学同元现代主义理论有了诸多的相通之处,可以共同迎接“后现代之后”文学理论及文化理论发展的重大挑战。

关键词:琳达·哈琴;反讽美学;反讽政见;元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2)02-0079-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220208

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又译哈钦,1947—)是加拿大当代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美学家。她对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反讽美学和反讽政治美学有独到的研究,在英语学界甚至整个当代理论界都很有影响。她的理论著述涉及文学、电影、政治,她对西方后现代、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非洲后殖民和中国先锋派等,都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些并非都属于后现代主义,但是都具有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因此,在哈琴看来,在中国语境下讨论和研究后现代之后的问题也是应有之意。另外,由于从欧洲(意大利)留学归国,哈琴能够把欧洲当代学术的新进展与加拿大的传统结合起来,如加拿大最著名的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N. Frye)试图把文学批评和西方文学传统(包括《圣经》、希腊罗马神话)相结合。这一本国学术资源的深刻影响对于哈琴提出“后现代主义的反讽政治美学”有着直接的酵母作用。另外,加拿大社会学家、传播学家麦克卢恩(Marshall McLuhan)以其新颖的社会传播思想启迪了哈琴,促使她从书斋的文学研究转向更为广阔的文化美学研究。再者,哈琴继承了欧洲人文精神传统,不同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同时,她往往更注重加拿大多元文化的“马赛克”(multi-cultural mosaic)而不是美国的“大熔炉”(melting pot)^[1]。多元文化“马赛克”力图让来自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保留其原生态,而非泯灭其特色和差异。尤其是她对于后现代语境中的反讽美学有独到的见识和理论,可谓是对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修正性研究成果,蕴含着属于未来的前沿性学术认知,蕴含着哈琴的反讽理论反思消极后现代的学术意图。

一、哈琴的反讽美学理论

反讽(irony)最早作为修辞出现于文献中,后来逐渐地进入了诗学和美学的领域。反讽理论经过了

收稿日期:2021-04-22

作者简介:王洪岳(1963—),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当代文艺理论与美学。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元现代文论研究”(19FZW039)。

古希腊苏格拉底的修辞学反讽、近代浪漫主义反讽、现代新批评反讽、后现代反讽等历史形态^{[2]4}。苏格拉底的反讽基本上属于修辞学的反讽,到浪漫主义时期的施莱格尔(Friedrich Don Schlegel)提出了哲学反讽,即思维的“永恒的灵活性”,体现出真理在生成的过程中,而非在固定的本质;能够否定自身,是哲学反讽存在的关键,反讽带来思想精神的绝对自由。新批评的反讽观在浪漫主义基础上有所倒退,专注于文本修辞的反讽。罗蒂(Richard Rorty)认为反讽是现代自由主义道德规范的一部分,一个“反讽主义者”需要“认真严肃地面对他或她自己最核心信念与欲望的偶然性,他们秉持历史主义与唯名论的信仰,不再相信那些核心的信念与欲望的背后,还有一个超越时间与机缘的基础”。唯有“反讽主义的自由主义”以其智慧和张力“希望苦难会减少,人对人的侮辱会停止”,来寻求沟通和协调,以实现真正的民主^{[3]6}。罗蒂的反讽观否定任何形而上学的前提。

真正推进反讽理论是哈琴的反讽理论。她的反讽理论可谓是后现代反讽理论中的异类。哈琴的反讽研究是和戏仿结合在一起的,她最早在对后现代小说研究中注意到反讽的重要性。哈琴对反讽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其著作《反讽之锋芒:反讽的理论及政见》,但她的整个研究也渗透着一种不同于一般后现代的反讽意识。“后现代反讽”呈现出一种哈琴对于后现代理论话语的质疑或试图越出其局限的努力,是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略带轻松的反思或超越。不同于此前人们对反讽的运用,哈琴的后现代反讽意在否定中重建某种价值的期待。她醉心于后现代主义政治研究,而且她的政治概念是宽泛的,几乎和文化相等,她期待反讽能够使后现代文化跃出意义离散的废墟之地。文本化、游戏化、语言中心论、铲平鸿沟、平面化、荒诞、无意义、反崇高、习惯死亡、干什么都行等后现代文化观念和文论思想充斥于当代各种文本当中。加拿大社会和思想界、艺术界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哈琴通过后现代主义反讽美学,试图理解、阐释和超越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扩张,挖掘和探察后现代及之后的建构性资源。

首先,在哈琴看来,后现代和反讽之间有一种契合度。后现代的反叛一切、重思一切、重估一切的思维方式,借助于语言来游戏世界、扩张世界、占领世界的文本观念,和反讽本身所具有的语义充满张力、甚至自相矛盾的状况,可谓不谋而合。因此,充满了智性的带距离感的反讽就和后现代近乎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了一起。

其次,哈琴的后现代反讽美学理论存在一定的内在张力。这就是其本身所蕴含的语义差:后现代的反讽(irony of postmodern)和后现代反讽(postmodern irony)的区别。前者指后现代所拥有的反讽的本性,与之俱来的反讽性;后者指的是后现代时代思潮中所具有的反讽及其所表达的矛盾性、悖论性,是艺术家、广告商人、文化策划者所中意的一种自我嘲讽和嘲讽他人的观念或手法。

再次,哈琴还在研究后现代建筑的“戏仿”(parody)时,丰富了自己关于后现代主义诗学和反讽美学的新观点。本来,戏仿和反讽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其产生的语境、表达的方式、导致的结果都是近似的,戏仿和反讽一样均具有建构和解构的双重力量。哈琴继承了詹克斯(Charles Jencks)关于后现代主义(建筑)的思想,即双重编码、含混和多元性。詹克斯认为“双重编码”就是“新旧结合,雅俗共赏”^{[4]33},这是双重编码之于戏仿,打破了一般模仿的做作,而赋予其滑稽有趣的特点,同时又赋予其在旧、俗当中带有新、雅的气质。后现代元小说也为其提供了研究的素材,所以哈琴致力于研究后现代元小说(即历史书写元小说 autobiographic metafiction),以突显这类小说既有内涵又有趣味的特点。她看到了戏仿和反讽都不是简单拼贴和沿袭旧制,而是“对前人的艺术作品进行修改、戏弄、颠倒和‘跨语境化’(trans-contextualizing)操作的整体性结构的模仿过程”^{[5]11}。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戏仿“通过赋予旧形式以新的意义显示了对历史的评判意识和对历史的热爱”^{[6]31}。这一观点别出心裁,是哈琴对后现代晚期戏仿进行探索的成果。在此意义上,哈琴的后现代主义反讽和戏仿实际上在行使走出后现代的话语权力,在准备“后现代之后”人类文化艺术如何再造的重大理论问题。

二、哈琴的反讽美学与文化政治的关系

(一) 哈琴的后现代政见

在哈琴的反讽美学中,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品格:政治性(政见)。哈琴把自己关于反讽的专著命名为《反讽之锋芒:反讽的理论与政见》,这里,政见(politics)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政治学。那么,为何她把反讽和政治(政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和论述?这关涉到哈琴反讽美学理论的目的、力度和品位。

哈琴融合了德曼和罗蒂关于反讽的思想,这种融合建立在对自由政治的维护之基础上。这也是哈琴反讽理论的严肃的政治性的一面。后现代反讽的早期代表人物有保罗·德曼、理查德·罗蒂。1977年,德曼认为:“反讽是寓言的永远的错误基调。”寓言符号和意义之间处于永远的错位当中。无所不在的悖论就此而产生。这正是后现代反讽的体现。罗蒂则提出了“自由反讽”概念,反讽是实现自由的一种悖反意义上的途径。换言之,自由的获得并非理所当然,而是有其偶然性。罗蒂意在鼓励人们为了自由的永久实现要不懈努力。德曼关注的是反讽的语义特点,罗蒂谈的是反讽与自由的关系即反讽的意识。当然,哈琴借助于反讽来维护和实现自由,落脚点恰恰在政见(政治)上。在哈琴看来,“反讽常常作为一种政治的反讽,标识着某种立场,又在艺术创作中体现为一种审美范畴”^[7]⁵⁴。在此哈琴明确提出了反讽作为一种审美范畴的美学命题,将之从一般修辞学概念、诗学批评话语推进到美学理论的高度。为了推进自己的论证,她提出了“反讽的游戏及其严肃性”。在消极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后现代的游戏就是一种完全滑稽的、解构性的、娱乐至死的活动。然而哈琴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反讽“可能是当今时代我们能够保持严肃的唯一方式”^[4]⁵⁴。这就赋予了我们对于消极后现代反思的方向或切入点。后现代一度被人们认定为唯有滑稽的甚至油滑的嘻哈文化、嬉皮士文化,最多是雅皮士文化辗转精英文化的杂糅体。殊不知,后现代也应该有一种建构性的、指向未来的维度。

因此,哈琴的反讽理论不是一种修辞学(修辞格),也非人生态度;也不仅仅是一种话语策略或实践,而是包含了上述诸方面质素的一种美学理论。因此,哈琴的反讽美学理论就和宽泛意义上的政治挂起钩来了。而政治属于关乎正义之实现的权力场域活动。哈琴把反讽放置在当代社会特别是政治领域当中去构建,因而其语境因素、发出者和接受者在共同的政治语境中的理解和解释的力量,也就是反讽所具有的建构—解构的美学张力,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

(二) 反讽概念的婉和性

作为女性学者,哈琴不但重视反讽概念所具有的关于在生活世界中的政见的锋芒性,她还发现了反讽概念的婉和性。而这一点更具有美学的建构性意义。有学者认为:“反讽在话语结构中产生的评判性锋芒和情感上的婉和被视作一种能在各种政治立场上起到平衡作用的话语策略。”^[8]人们在实践中实际上日益运用各种各样的话语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如何平衡这些诉求,就涉及到社会的公正及其表达形式(话语)。反讽既具有传统男性社会政治的锋芒性,也具有现代女性社会政治运演的婉和性,因而哈琴的反讽和政见的关系具有双重的意味。正是这一双重性,淡化了两千余年来西方关于反讽的那种咄咄逼人或诡异之气,而赋予其温和的建构性特征,同时又不乏思想的光芒。这种新型政治(政见)的姿态在当代尤为重要。在当今欧美国家,女性开始大量进入政界,加拿大新政府女性就占了一半,这自然与当代加拿大最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哈琴多年来致力于女性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呼吁和思想不无关系。

由这种婉和性,哈琴看到了反讽所具有的张力和幽默的特征,她指出:“我对反讽跨观念的政见的兴趣,使我看到有必要在研究反讽的时候,采取这样一种方法,不把它看做是一种有限的修辞比喻,也不把它看作是一种延伸的生活态度,而把它看做是一种在(言语)语言层面或(音乐、视觉、文本)形式层面上的话语策略。之所以选择话语作为讨论的范围和场所,也是想要确保能够考虑到反讽发生功用的社

会层面或互动层面,不论其情境是闲谈还是小说阅读。”^{[9]3} 哈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温和的幽默的反讽来达到社会或政治层面的两性互动,而这种目的的实现体现在社会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比如日常闲谈或小说构思写作与阅读。反讽效果的产生是建立在整个的关系之中,也就是体现于人通过语言而达至的意义维度。这一观点既是后现代主义的,也是语言论的,同时又带有胡塞尔现象学的印迹。在安德森(Perry Anderson)看来,存在一种反讽式的幽默^{[10]2}。这种反讽幽默观也是对此前有关反讽观念的颠覆,至少是一种丰富和补充。哈琴使得这种带幽默感的反讽紧密地与政见或政治结合起来,几乎走到了后现代的边缘地带。她在思考的问题是置身于后现代语境,如何更好地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和自由理想。而反讽所具有的张力、悖论意义,以及思维锋芒与温婉相结合的特性,放置于政治表达领域或文化政治美学中,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反讽的跨观念或悖论式的多元意义在文学修辞、感性审美、社会生活、政见表达领域具有无限广阔的前景,因而哈琴非常看重这一从修辞到美学、哲学到政治的表达方式和观念。反讽具有造成意义的复杂、包容、关联和差异等特性,这和政治或政见的构成类似,是在使用的场域中生成意义和价值的,其意义和价值并非形而上学地存在着。另外,哈琴还区分了两种反讽:一种是表达出新的反对立场的或具有建设性功用的反讽,另一种是以明显的否定性的方式运作的反讽^{[9]9-10}。反讽不仅关乎语境和反讽者,还与整个文化文本的参与者或观察者有关。不同的接受者面对同样的作品/文本会产生很大的接受差异。由于美学所具有的柔化政治的咄咄逼人,又可以把文学艺术及感性结构与广大的社会政治生活结合起来,因此它是勾连文学修辞、哲学和政治学维度的核心领域。无论是建构性还是解构性的文化或审美维度,反讽所具有的接受上的差异或区别,正是哈琴所研究的后现代反讽美学的表现特征。

哈琴在研究与反讽关系密切的戏仿时,同样善于捕捉和发现其所蕴含的建设性因素。戏仿不仅仅是滑稽性模仿,没有价值的垃圾,还是带有和原物并列、同构的意义,既在“戏”更在“仿”,并非纯然是“恶搞”之类肤浅仿制。不同于巴特的看法,在哈琴看来,戏仿的还是文本,因为她受到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影响,认为历史已经不是现实本身,而是一种叙述出来的文本,所以戏仿(叙述)的是文本而非现实本身,历史著述打上了浓厚的文学的色彩,而这个文本又和其他文本构成了一个新的“世界”(互文本性由是而形成)。但哈琴关于戏仿的观点不同于新历史主义的是,这个世界不但包含互文,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指涉真实的现实世界。因此,哈琴的戏仿理论就和反讽理论统一起来,并且和现实政治发生关联。

哈琴所揭示的反讽的锋芒性和婉和性均具有介入或参与政治建构的意义。前者往往可以以强力来参与政治运作本身,对于政治的吊诡或强权阴谋无疑具有极大的解构性,并可以瓦解政治的蛮力。后者可以化约那些紧张的、矛盾的政治语境和政见,借以表达出温和的、幽默的、带有美学眼光的自由境界。

(三)反讽的“边界张力”

哈琴的反讽理论具有溢出后现代的态势。她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中提出了“边界张力”(border tension),它产生于界限的逾越:介于文体之间,介于学科或话语之间,介于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并且具有争论性的是介于实践与理论之间^{[11]18-19}。这个介于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张力恰恰说明了哈琴的后现代反讽理论对于现实的态度,它不仅仅具有话语的权力或作用,还有介入现实实践的力量。哈琴还强调了反讽观照“后现代美学实验所具有的不可弱化的政治层面^{[11]4},在美学、诗学、艺术(包括造型艺术、音乐、文学、电影)等领域,都具有紧密相连的政治维度或政见表达。正是在尖锐锋芒或委婉曲折所导致的充满张力、悖论丛生的语境和社会中,哈琴所论的反讽具有了强烈的建构性价值。话语的发出者(反讽者)只是提供了反讽丰富意蕴的某个方面,它还需要接受者的接受。“真正的反讽必须包含说话者与接受者在特定情境下的信息互动,后者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反讽意义,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种话语活动中去”^[12]。哈琴认为,反讽者只是“使反讽产生”,接受者却“使反讽发生”^{[13]6}。也即是说,反讽者只是反讽之所以发生的前提条件,反讽的真正实现还需要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和体味。深究之,哈琴

之所以提出有些振聋发聩的后现代反讽及戏仿与政见关系的理论,这自然既与哈琴个人的秉性有关,更与加拿大国内女性地位和女权主义发育水平有关。不过这一话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题。

三、哈琴的反讽美学何以成为元现代的发端或源头

(一)哈琴的反讽观与元现代主义

在关于艺术作品接受的讨论中,德国美学家耀斯提出了阅读接受者与主人公的五种审美互动认同模式:联想式、钦慕式、同情式、净化式和反讽式认同。前四种认同模式与作品主人公都是基本一致或导致超越性诉求的,唯独反讽式认同模式带有极大的反向或异化取向。耀斯认为:“反讽式认同指的是这样一个审美接受层次:一种意料之中的认同呈现在观众或读者面前,只是为了供人们拒绝或反讽。这种反讽式的认同程序和幻觉的破坏是为了接受者对审美对象的不懈思考的关注,从而促进他审美的和道德的思考。”^{[14]277}反讽式认同的对象是“失去主人公气质的或反传统的主人公”,接受的定位是“异化(挑衅)”,往往在行为或态度规范上实现了“反应性创造”“感知的提炼”和“批判性反思”的进步^{[14]235}。在促进审美、道德的思考和批判性反思上,反讽具有潜在的巨大力量。它在促使主体更加能够客观审视对象的同时,也更能健全地反讽和反审自身,从而能够以更加饱满立体的方式参与新的审美、新的道德的建设,而不是如消极后现代那种放弃反思的身体美学张扬。正是在此意义上,哈琴的反讽理论开始溢出后现代的边界,抵达了一种新的境界。这种境界恰恰就是元现代。元现代是对前现代、现代即后现代的吸收和超越,元现代性是从后现代性发展而来^[15],在其中反讽起到了促进后现代性裂变的重要作用^[16]。当然,这里称的孕育或发展并非直接产生,而是前者的文化成分或因素对于促成后者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在语义学张力和语用学张力的双重张力之间的反讽

反讽所蕴含的语义学张力和应用实践中的语用学张力,是哈琴关于反讽理论对于后现代话语突破的关键所在。哈琴身上打上了加拿大作为西方非主流的边缘文化地带的鲜明特征。边缘、女性、自由、公正等价值观和文化观,赋予了哈琴借助于反讽来实现学术理想和社会公正的动机,这也是她通过反讽理论来达到思维异变目的的根本所在。

正是反讽的语义学张力为反讽的语用学张力带来了动力,在反讽语境中,未说和已说构成了平衡。后现代导致了多元文化共生,主流文化、严肃文化、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经典作品同边缘文化、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互融互通、界限趋于消弭,鸿沟被填平,宗教信仰淡漠。这使得文化本身陷入了碎片化、扁平化、游戏化,世间没有了上帝或圣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来源被阻断,人们无从思考,也不用思考。后现代社会,人们随波逐流,及时行乐,人云亦云,得过且过,娱乐至死,成为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说它还有某种价值,就在于教条化宏大叙事没有了存身之地。哈琴论证了反讽的深奥之处,她在引述一个案例时,深入探讨了反讽如果不与语境相联,如果不考虑接受者的背景身份,如果不提高接受者的文化思考程度,如果不超出种族主义、族群主义、国家主义等带有狭隘性的文化范型,仍以固守的眼光来看待老问题,那么,真正的文化交融、种族和解、阶层互通,仍然不可实现,仅仅表面上打破所谓鸿沟。消极的后现代主义给予人们的是表层的平面化和平等化,那些被种种话语和文化遮蔽的暗角尚需要新的文化批判的冲击。这种契机和希望便是汲取消极后现代主义的大胆和狂放所带来的自由、平等精神,同时更多地发掘积极后现代主义的成果,以建设性的姿态,修补现代化和后现代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和自我以及人和超越性维度之间的严重断裂局面,重思“后现代之后”的人类命运,重构人类文化的基本原则和情感表现方式。

(三)哈琴反讽美学的政治性、批判性功能或观念重建

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文化逻辑的考察,认为在后现代社会,“政

治性、批判性艺术创作的机会”已经不可能再生^{[17]439}；艺术成了“空洞的戏仿”^{[17]442}。然而哈琴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她认为：“在当今的各种艺术中，反讽似乎具有一种独特的政治功能。”^{[18]89}哈琴研究者卡米凯尔(Thomas Carmichael)曾经试图弥合詹姆逊和哈琴之间的分野，认为“哈琴对后现代主义的‘妥协政治’(compromised politics)的解读与詹姆逊对政治无意识及文化文本的理解有着诸多共通之处”^{[19]24}。尊重差异、欢迎多元主义、认同妥协政治，这些都是哈琴对于反讽和戏仿的研究中富有建设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妥协的政治”对于那些不愿妥协或不会妥协的国家、民族、社会和政客来说极其重要，具有相当深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哈琴所强调的反讽的政治功能其实是人类思维和语言延续发展至今所必然具有的特征。整个当代文学几乎就是反讽的天下，耀斯甚至认为，整个小说、文学，“其最高成就都是反讽的作品”^{[14]282}。所以，正因为在后现代时期，反讽美学理论吸收了自古希腊苏格拉底、浪漫主义、存在主义者克尔凯郭尔、新批评关于反讽的理论，同时又尽量超越了他们的观点，而将自己置身于反讽之所以发生的语境和自身所处的存在悖论当中。在此体认的基础上，反讽提出者和接受者均需要从当代的文化政治维度，共同参与这一场场“同谋性的批判”^{[18]73}。曾繁仁先生在给陈后亮博士专著作序时指出：“哈琴后现代诗学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学’旨趣向我们昭示了后现代主义理论是有着人文关怀维度的，她的反讽与戏仿带有现实批判的性质。”^[4]哈琴在应对或反思后现代主义时，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方式，就是她力图将之加以“稀释”，即把后现代主义那些曾经被太多诟病的东西从两个方面进行新的理解和阐释，从而赋予了后现代主义相当程度的积极性和建设性维度。这两个方面就是：往后看，她以现代主义的精神探索来研究和观照后现代主义，赋予了后者以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意味；往前看，她以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理论思考，或者说以她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学的反讽新解来重释反讽和戏仿，发现并赋予反讽以严肃的新意义，赋予了戏仿以认真的意图，并且预示了“后现代之后”美学和文论的应然走向。因此，后现代理论发展到哈琴等一批学者和艺术家这里，已然出现溢出或涨破的迹象。

“后现代之后”的理论创造，需要的是感同身受，体验、反思，并一起参与和拥抱这个人类共同生息期间的生活世界，无论它是美好的还是糟糕的，恶化的还是趋善的，因为人们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哈琴所认为的“反讽可能是当今时代我们能够保持严肃的唯一方式”就不是空穴来风或话语游戏，而是经过了切身感受和冷静分析的真言。针对反讽和戏仿所存在的同一问题，男性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的看法是悲观的，而女性后现代主义者哈琴却态度鲜明，充满了乐观和理性的态度。在哈琴之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反讽是发出者意图之体现，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反讽是接受者的理解(说话人并没有反讽意图)。具体而言，哈琴反对非此即彼的反讽观，认为反讽是一种“述行性事件”(performative activity)，其意义的产生是由包括阐释者、反讽者以及语境等综合因素造成的^{[13]123}。戏仿也是如此，戏仿的不是过去的历史事件(event)，而是被选择而进入文本或档案的事件的部分构成历史“事实”(fact)。哈琴理解的戏仿不仅仅是詹姆逊所说的“拼贴”及其所表征的支离破碎、东拼西凑的历史仿像的影子。她所理解的戏仿是我们唯一恰当地对待历史(文本)的方式，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和现实遭遇、交融，并同时两者都发出质疑，既质疑历史，也质疑现实政治。戏仿与反讽甚至批判有相似的功能，它能够重构存在、现实、历史和文化文本，在解构的同时也在建构着。对此复杂的理论运演和文化政治批判及其相互关系，哈琴显得踌躇满志，她不无自信地认为：“一个看似有限的风格的戏仿，事实上却能支撑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批判。”^{[20]8}这种论证方法已经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拼贴、解构，而是对历史的审视，对文化固化及其霸权的犀利颠覆，是对语言文字游戏观念的抛弃，因而带有了我们所说的元现代主义的包容性和建构性特征。

哈琴除了深入研究反讽和戏仿并提出自己精辟的见解和观点之外，她还重点探讨过与之有着很深渊源的“历史书写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不同于现代主义元小说，哈琴所命名的这种元小说是那种处于后现代元小说；而且其要旨不在形式主义式的脱离文本赖以产生的语境，也不像现代主义元小说那样依赖于唯我主义或自恋主义；同时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那般地自觉承担社会

道义或张扬个性;而是依托于语境、历史、社会、政治等维度,并以反讽、戏仿以及元思维、元小说的方式对此加以新的描写,在一种张力或中位之处获得叙述的动力,并力图把读者重新吸引过来。哈琴自己对此有很清晰的认知和阐释:“这些不单纯的、自相矛盾的历史书写元小说将自己置于历史语境之中,与此同时,拒不放弃它作为小说所拥有的自主性。”^[6]¹²⁴ 从而赋予其新的审美意蕴和政治批判的意旨。

哈琴关于反讽和戏仿,以及“历史书写元小说”理论,以敏锐的眼光,批判的锋芒,中道的表述,在后现代的氛围中将其运用于文化政治分析的过程中,再激活或产生新意,从而最终将其引向文化政治实践。这些理论观点伴随着她的乐观主义和女性主义的鲜明特点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走出了后现代主义,从而打上了元现代主义的理论色彩,她关于历史书写元小说的观点也可视为元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

(四) 借鉴康德中道观的反讽美学在“后现代之后”仍然有效

不同于现代主义不承认现实的存在,而只在心理及话语层面运作的深刻但不无偏执的方法论倾向,也不同于一般的后现代主义热衷于纯粹话语的游戏和碎片化的狂欢,当然更不同于现实主义文本观对世界的直接指涉,不同于浪漫主义者对于精神个体的塑造,哈琴试图在这诸种思想中提出理论再造的可能性。在这种理论思维的运演当中,她采取了一种康德式中道或折中主义方法论。哈琴认为这条道路对晚期后现代主义来说依然有效。真实的世界存在着,但是我们的理性能力无从真正把握,在康德那里就是加了括号,悬置起来不予探究的世界。康德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二律背反”,试图探究物自体和现象界在认识论中的关系问题。他把这种哲学方法论推及其他领域,如在其美学中,提出了关于审美鉴赏在质、量、关系和模态的四大判断(契机)。它把按照原来探究自然和社会的理论方法无法想象和完成的对事物(存在)的特征予以了深入的阐释。哈琴对于后现代反讽美学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就有康德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子,她往往在事物对立的要素中找到一个契合点,并寻到论证的契机,给予别出心裁的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策略,同元现代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和策略,尤其是其中位(metaxis)方法非常接近。她的方法论和致思路径,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她把后现代之前的诸种关于反讽、戏仿和元小说的相关理论放在新的文化政治语境当中,从而在赋予这些概念以时代的新内容之同时,也激发了新思想、新理论的诞生。因此,哈琴的反讽、戏仿、元小说理论及其方法论,已经越出后现代范畴,而进入到了一个别有洞天的新视域。这个新视域同我们所探讨的元现代主义已经非常接近,或者说,哈琴关于反讽、戏仿和历史书写元小说的理论就是元现代理论的一部分了。

[参 考 文 献]

- [1] 朱刚,刘雪岚. 琳达·哈钦访谈录[J]. 外国文学评论,1999(1).
- [2] 周丹丹. 哈琴的后现代反讽理论研究[D]. 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7.
- [3] 理查德·罗蒂. 偶然、反讽与团结[M]. 徐文瑞,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4] 陈后亮. 事实、文本与再现:琳达·哈钦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研究[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
- [5] Linda Hutcheon. *A Theory of Parody: The Teaching of Twentieth-century Art Forms* [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 [6] Linda Hutcheon.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 [7] 琳达·哈琴. 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M]. 李杨,李锋,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8] 刘晓萍. 跨观念政见与情感的对立调和——论哈琴的后现代艺术反讽观[J]. 社会科学家,2014(7).
- [9] 琳达·哈琴. 反讽的锋芒:反讽的理论与政见[M]. 徐晓雯,译.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 [10] 佩里·安德森. 后现代性的起源[M]. 紫辰,合章,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11] Linda Hutche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M]. Routledge,2002.
- [12] 陈后亮. 后现代视野下的反讽研究——兼谈哈钦的后现代反讽观[J]. 社会科学论坛,2010(14).

- [13] Linda Hutcheon. *Irony's Edg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Irony*[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5.
- [14] 汉斯·罗伯特·耀斯. 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 顾建光, 顾静宇, 张乐天,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 [15] 王洪岳. “元现代”: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新特征[J].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01-08.
- [16] 王洪岳. 元现代理论视野中的审美阐释[J]. 求索, 2018(2).
- [17] 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 [18] Linda Hutcheon. *Splitting Image: Contemporary Canadian Ironies*[M]. Don Mil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9] Thomas Carmichael. “Postmodernism and History: Complicitous Critique and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J], in John N. Duvall, ed., *Productive Postmodernism: Consuming Histories and Cultural Studies*[C].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 [20] Linda Hutcheon. *Parody and Romantic Ideology, Romantic Parodies, 1797-1831*[C]. ed. David. R. Ewen,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92.

On the Meta-Modernity of Linda Hutcheon's Ironic Aesthetics

Wang Hongyue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Abstract: Linda Hutcheon, a contemporary Canadian literary and art theoris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historical irony theory and the postmodern irony view of the same period with her unique irony theory. She combines irony with postmodern politics, and tries to change the deconstructive core of postmodern culture and reconstruct the major problems of cultural theory with tension and constructiveness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post-postmodern". It is at this point that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Hutcheon's ironic political aesthetics and meta-modernism, which can jointly meet the major challen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theory after postmodernism.

Keywords: Linda Hutcheon; irony aesthetics; ironical politics; meta-modernity

[责任编辑:陈忻]